

例如，古船中发现了大量的铜钱，数量在一万枚以上。令人好奇的是，这些铜钱的式样不仅是南宋时期的，还包括之前各个朝代，最远有汉代的五铢钱。如果这些都是船上人的收藏品，那数量未免太多了一点。对此，魏峻推测，这些宋代之前朝代式样的铜钱可能都是当时的人伪造的。“因为铜作为战略物资，在当时是不能轻易大量出口的，所以把铜铸造成前朝古币的样子，可能是一种逃脱监管、将这些材料偷运出去的方法。”

再如，以今人的常规思维推测，在堆码船货时，更重更牢固的铁器会放在靠下的船舱，更轻更脆弱的瓷器则放在靠上的船舱。然而，“南海I号”的发掘却显示这批船货的实际堆码方式与前述恰恰相反。

中国水下考古的开篇

谁能想到，如今备受瞩目的“南海I号”，最初为人所知是由于35年前的一次阴差阳错。

1987年8月，英国的海上探险和救捞公司与当时的中国交通部广州救捞局合作，在南海的上下川岛海域寻找当年东印度公司的沉船“莱茵堡号”。他们没有找到原有的目标，却意外地在27米深的海底发现了另一条古代沉船，并打捞出黄金饰品、瓷器等文物。专家初步判定这艘沉船的年代为宋元之间，有巨大的考古价值，后来将其命名为“南海I号”。然而，“南海I号”的打捞，却要等到整整20年之后——1987年时，中国的水下考古刚刚起步，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应对如此高难度的挑战。

在过去的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人对水下文化遗产并没有太多的概念，直到1986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次拍卖。拍品是8万件中国清代的青花瓷，来自1985年英国人在中国南海打捞出的一艘商船。几经交涉，中国政府依然无法阻止这次拍卖，为了解和研究这些瓷器的价值，国家文物局派专家冯先铭和耿宝昌带着3万美元参加拍卖，规定“资金使用限度不超过瓷器价值的三倍”。不料最终两人空手而归，因为拍卖会上瓷器的最后成交价竟然高出了起拍价十倍。这次经历让耿宝昌刻骨铭心，回国后他向国家文物局递交了一份书面报告，建议中国考古应向水下考古领域拓展。

拍卖会这年冬天，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今天的国家博物馆前身）馆长的俞伟超找到考古队员张威，谈起了水下考古，而那时的张威还根本不知道水下考古是什么。

1987年5月，张威和同事杨林收到了一份前往荷兰参与水下考古项目的邀请。出乎对方意料的是，这两位中国人连最基本的潜水都不会。于是，他俩在当地从零开始学习，后来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水下考古队员。7月，他们结束了在荷兰的培训；一个月之后，“南海I号”被发现。

下图：2020年9月4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的“浮槎万里——中国古代陶瓷海上贸易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隆重开幕。



1989年，国家文物局首个水下考古项目立项，目标正是“南海I号”。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1987年发现古沉船的地理坐标已记录在案；而当年打捞上来的那些文物揭开了“面纱一角”，足以让人心驰神往。

这年冬天，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日本水中考古学研究所合作，正式开始对“南海I号”进行考古调查，这是中国水下考古的起点。这次调查中，张威成为第一位触摸到“南海I号”的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

由于海况和资金等原因，对“南海I号”的考古延迟下来。1999年，香港商人陈来发创建名为“中国水下考古与探索协会（香港）”的组织，发起募捐，为“南海I号”水下考古捐助港币120万元。

得到这笔捐助后，2001年4月，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联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水下考古专业队员共12人，再次探寻“南海I号”。这次调查中，考古队对沉船进行了精确的定位。

2002年3月至5月间，考古队再度下水，对海底沉船进行细挖掘、细打捞，打捞出文物4000多件。这次调查的另一重大发现，是考古队员在平时几乎没有能见度的水下偶遇清流，第一次拍下了“南海I号”的完整影像：古船甲板以下的部分基本保存完整，这令人激动不已。

攻破大量“不可能”

1987年，中英联合打捞队曾触摸到南海I号的桅杆；而在2001年大规模探查时，这部分遗迹已经消失。采取怎样的方式，才能既保护